

“尊孔”与“日中亲善”：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始末

张子康

“Confucius worship” and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 An Analysis of the 1935 Confucianism Conference in Japan

ZHANG Zikang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of 1931,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surg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Japanese Shibunkai (斯文会) held a grand Confucianism conference in 1935 in lin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f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 towards China. Slogans such as “Respect Confucius” and “Promote Confucianism” were used to draw in Chinese people and dispel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in China.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Japanese side used diplomatic means to entice influential Chinese scholars, celebrities and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However, despite the grandeur of the Confucian conference, China's reaction to the event showed that not only was it ineffective, but it also provoked Chinese vigilance and resistance.

Keywords: The 1935 Confucianism conference, Yushima Seidō, Confucius worship,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

关键词：儒道大会、汤岛圣堂、尊孔、中日亲善

1935年，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的汤岛圣堂重建落成，日本近代最大的儒教组织斯文会借此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儒教活动——汤岛圣堂复兴儒道大会（下文简称儒道大会）。此次儒道大会不仅是日本近代史上规格最高、最为隆重的儒教活动，并且由于伪满洲皇帝溥仪此前的参拜及中国孔颜两家代表史无前例的渡海赴会，更是堪称日本儒教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儒道大会对内集中展现了日本近代儒教主义的文教政策，对外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华谋求“中日亲善”，建立“日中满提携”的东亚秩序为宗旨的“文化外交”上的重要举措。不过，对于儒道大会中日学界还未有专门研究，虽偶有提及此事，不仅模糊不清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错讹。1935年日本儒道大会的来龙去脉如何？日本就邀请民国学者、名流参会进行了怎样的交涉，中方人士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儒道大会对华外交的目的最终结果如何？本文以儒道大会的原始材料、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中日新闻报刊等史料为依据，努力还原此段史实，一览儒道大会的全貌，并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 汤岛圣堂与近代日本孔子祭的复兴

释奠一词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可见，释奠原指以币帛、食物、酒等祭品供奉于“先圣先师”，并非特指孔子，在汉以后逐渐成为祭祀孔子仪式的专称。

日本祭孔由来已久，且延续至今。公元701年，日本首次举行了祭祀孔子的释奠礼，《大宝律令》之《学令》规定每年都要在中央的大学寮与地方的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宣父”的释奠礼，并在大学寮的庙堂院中建有孔庙。中世时期，虽然在政权更迭与战乱中公家的释奠一度中断，孔庙也因火灾等原因多次损毁，但九州菊池氏及足利学校¹⁾等地方势力和学校中依然维持着祭孔活动。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的祭孔仪式迎来了顶峰。不独公武两家，各藩藩校、乡校大多都定期举办祭孔仪式，并且此风气也影响到了近世大量出现的私塾之中。其中，汤岛圣堂的建立作为江户时代儒教繁荣的象征，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其历年的释奠无疑是近世祭孔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代表。

1633年，使儒教开始摆脱对佛教的依附地位并推动儒教成为幕府官方思想的林罗山在上野忍冈的宅邸内建成名为“先圣殿”孔子庙，并参照朱子的《沧州精舍释菜仪》举行释菜（释菜的菜字指的是野菜等祭品，一般被看做是释奠的略式）仪式。1690年，在尊崇儒学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下，林家的孔庙改筑到了神田台（现在的汤岛），纲吉亲笔题写改为“大成殿”之名，大成殿连同周边附属建筑通称为圣堂，即汤岛圣堂。宽政异学之禁后，圣堂的林家私塾被扩张为幕府直属的昌平坂学问所（“昌平”之名取自孔子出生的村名），成为江户时期教育及学问的中心，同时圣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江户时代汤岛圣堂释奠的样式虽几经变更，但从仪式的重要性与礼制流程的完备程度上无疑达到了历代祭孔的顶峰。德川将军也常携幕府要员参列，且将军还曾一度由观礼变为直接参礼，以献官身份进行祭祀。

汤岛圣堂的建立与释奠正代表了儒教在德川时代正统思想的地位，对于孔子的尊崇从统治阶层渗透到了一般庶民，使得圣人孔子的形象扎根于日本的精神领域，这一荣光无疑在日本儒者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随着德川幕府走向崩溃，汤岛圣堂的释奠在明治前夕即庆应三年（1867）中断。维新后祭孔依旧不行，后一度被改为“学神祭”，大成殿还被充当博物馆乃至仓库之用，这正是在“文明开化”的西学风潮下儒教式微的反映。

明治中期，日本社会思潮发生转向，在元田永孚等人的推动下明言“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的《教育大旨》在1879年以天皇的名义公布，表明了儒教复兴的迹象。仅一年后，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组织下“斯文学会”应运而生，以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会长，聚集了重野安绎、冈本监辅、中村正直、谷干城等汉学家，成立之初就召集了1500人以上的会员²⁾。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标志着基于儒教主义的文教政策得以确立。孔子作为“人格完满”的圣人、东洋伦理道德的根基不仅得到日本汉学界的尊崇，并且还获得了日本政经界乃至军界的支持。同时日本儒教还呈现出与国家主义、万世一系的天皇观结合的态势，在明治后期形成了所谓的“孔子教”，在文教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儒教复兴的背景下，日本部分地区的祭孔活动得到了恢复。关西的儒者藤泽南岳获赠了原高松藩藩

1) 足利学校被认为是日本目前已知最为古老的学校，以教授儒学为中心，是日本古代关东地区事实上的最高学府。

2) 斯文会編『斯文六十年史』（斯文会、1929年）、219-221頁。

校讲道馆的孔子像，1888年在私塾泊园书院进行了释奠仪式，1903年组建释奠会在大阪市道明寺天满宫修建孔庙，举行神道式的祭孔仪式³⁾。更早些时候，足利学校在1882年重新进行了释奠仪式⁴⁾。此外明治后期还有一些个人及团体组建孔子会以及举行祭孔活动⁵⁾。由此，恢复汤岛圣堂的祭孔典礼也正是大势所趋。明治末期，汤岛圣堂被置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的管理下，而校长嘉纳治五郎正是复活圣堂祭孔的关键人物。嘉纳以“柔道之父”“日本体育之父”闻名，同时也是近代中日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教育家，尤其曾为中国留学生开设弘文学院，被称作日本的“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嘉纳自幼受儒学熏陶，又曾受教于著名汉学家中村正直，深厚的儒学思想背景使其不仅尊崇孔子的人格与思想还始终倡导以孔子之教为基础的现代道德教育。嘉纳认为日本自古以来的道德风化实有赖于孔子之教，称孔夫子是日本的大恩人，如今也决不能忘记报恩⁶⁾，故而嘉纳在1894年升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之初便有复兴汤岛圣堂祭孔的想法，终于在其长达26年的任职期间达成了此志向。

明治34年（1901年），嘉纳与涩泽荣一商议后，成立了“圣庙保存会”，着手修复圣堂，筹划组织恢复孔子祭的事宜⁷⁾。1907年1月在获得多方支持后，成立了“孔子祭典会”，以嘉纳治五郎为委员长，以及评议员及委员若干人，其中就包括加藤弘之、涩泽荣一、井上哲次郎、重野安绎、伊泽修二、井上圆了、桑原鹭藏等人。孔子祭典会于当年4月28日，在汤岛圣堂恢复了中断了40年的孔子祭典仪式，由此开启了汤岛圣堂的“光明复辉时代”⁸⁾。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组建孔子祭典会恢复汤岛圣堂祭孔典礼一事传到了中国，又因与清廷升祭孔为大祭的时间正重合，更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注目，众多报刊予以了报道。

其后“孔子祭典会”每年举办释奠仪式，并邀请政界、军界、商界名流参加活动，其中也可见中国人的身影。1918年“孔子祭典会”与“斯文学会”以及“研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孔子教会”“汉文学会”等一干文化、学术协会合并为新的“斯文会”，祭祀孔子的这一职能也为“斯文会”中的“祭典部”所继承，首任部长依然是嘉纳治五郎⁹⁾。

二 汤岛圣堂的重建与儒道大会的筹划

1918年成立的斯文会，整合了当时日本儒教界的力量，成为了日本儒教主义者的大本营。初成立的斯文会以原文部大臣小松原英太郎为会长，同为官僚股野琢为副会长，其后协会人员几经变更，1935年儒道大会召开时领导职务已改由日本皇族与华族担任，伏见宫博恭王为总裁、德川宗家16代当主公爵德川家达担任会长，副会长是德川国顺、阪谷芳郎¹⁰⁾、服部宇之吉（兼总务）。斯文会分为教化、教育、研究、祭典、

3) 鈴木三八男編『日本の孔子廟と孔子像』（斯文会、1998年）、47-50頁。

4) 史跡足利学校事務所、足利市立美術館『足利学校——日本最古の学校 学びの心とその流れ』（足利市教育委員会、2004年）、111頁。

5) 斯文会編『日本漢學年表』（大修館書店、1977年）、431、443、447頁。「本會以外の孔子會」（『孔子祭典會會報』第5号、1912年）、17-18頁。

6) 嘉納治五郎「孔子祭典會趣意」、孔子祭典會編『諸名家孔子觀』（博文館、1910年）、1-2頁。

7) 藤堂良明「嘉納治五郎と孔子祭の復活」、筑波大学『草創期の湯島聖堂』（清流出版株式会社、2007年）、15頁。

8) 三宅米吉編、中山久四郎補『聖堂略志』（斯文会、1935年）、336頁。

9) 斯文会編『斯文六十年史』（斯文会、1929年）、317-321頁。

10) 阪谷芳郎（1863-1941），幕末汉学家阪谷朗庐的四男，涩泽荣一的女婿，财政家、政治家，曾任大藏省大臣、东京市

编辑五个部门，通过讲座演说、振兴汉文教育、促进学术研究、举办祭典仪式、刊发会志图书等方式扩大儒教的势力。

需要指出的是，斯文会作为日本近代规模最大的儒教团体并非一单纯的文化学术组织，其创立之初就主动贡献于《教育敕语》体制及万世一系的国体思想，如其《会则》第一章第一条言：“本财团的目的是，阐明儒道为主的东亚学术，以赞翼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宗旨，发挥我国国体之精华。”¹¹⁾这也正是斯文会能够得到日本政府扶持的原因。斯文会的代表人物首推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这位日本中国哲学的权威学者热心于构建独属日本的“孔子教”，一方面将改造后的儒教学说作为国体思想的辅翼，用于控制民众思想，阻遏共产主义等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又自诩日本才真实实现了孔子之道，赋予日本文化输出中国乃至惠泽整个世界的能力和“天命”¹²⁾，其部分学说无疑带有为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宣传的色彩。

1922年斯文会在汤岛圣堂举办了隆重的“孔夫子卒后二千四百年追远特别祭典”，邀请有台湾、朝鲜人士参会，除孔子祭外还连续举办了三场演讲会并有招待宴会、先哲遗墨展览会等活动。整个日本国内，以斯文会在汤岛圣堂的孔子祭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鹿儿岛，二松学舍、怀德堂、足利学校以及日本地方儒教组织联动举办追远祭孔活动，一时声势浩大¹³⁾。

然而就在一年后，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火灾致使汤岛圣堂基本燃烧殆尽，孔子像与四配像也都化为灰烬。为了延续每年祀孔的“例祭”，在得到文部大臣的许可后斯文会在第二年春天建造了临时的圣堂，还获赐了原藏在皇宫内的朱舜水亡命时带来的孔子像，就此举行了灾后的第一回祭典。圣堂遭到损毁的半个月后，时任斯文会总务的服部宇之吉等人就面见文部大臣，表达了复建圣堂的愿望。其后，由斯文会的代表与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文部大臣、贵族院、众议院两院议长、东京府知事、东京市市长等当权人物发起并于1926年成立了“圣堂复兴期成会”（以下简称期成会），着手募集重建圣堂所需的资金。期成会由德川家达为会长，涩泽荣一为副会长，阪谷芳郎为理事长，理事还包括松浦镇次郎、河井弥八、中村滕兵卫、服部宇之吉、三宅米吉、福岛甲子三等人。由于重建圣堂需要的资金巨大，在期成会成立之初，天皇就赐予了一万日元以示表率，继而展开了日本全国的募捐活动，最终筹集到了五十万日元。1933年4月24日着手开始重建圣堂的工事，并预期1935年4月下旬完工¹⁴⁾。

在1932年前后，斯文会的副会长也是期成会理事兼会长代理的阪谷芳郎认为趁圣堂重建的机会，正可以举行一次以东亚诸国共有的儒学为中心的大会，从而达到“团结同文同种的东亚民族”和“贡献于世界和平”¹⁵⁾的目的，提议交于斯文会的理事会进行讨论通过，并专门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制定具体的方案，在随后提交给政府的请愿书草案中如是说到：

市长、贵族院议员。

11) 斯文会「斯文会々则抄録」(『斯文』第1编第1号、1919年)、卷頭。

12) 服部宇之吉『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1917年)、289-290頁。相关研究见刘岳兵：《论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为例》，《学术月刊》2003年第05期；严绍璦：《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追踪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的“儒学观”：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个案解析》，《国际汉学》2012年第02期；张士杰，殷玥：《服部宇之吉孔子教的意识形态向度》，《东疆学刊》2020年第03期等。

13) 斯文会編『斯文六十年史』(斯文会、1929年)、332-335頁。

14) 三宅米吉編、中山久二郎補『聖堂略志』(斯文会、1935年)、76-80頁。

15)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1頁。

当下世界的趋势乃促进东亚民族的团结，然国际上诸种事情的发生，遂此事之实现遭遇困难。唯有从学术思想上入手，特别是使用同一文字的日满支三国，相信这是达成融合理解比较容易的方法。斯文会成员出于此考虑，以如上三国共有的儒学思想为本，广招学者，举办一大会议，创造精神联络的机会，以巩固同文同种的友谊、团结东亚民族为目的，进而贡献世界人类和平。¹⁶⁾

此后的递交政府的多封请愿书以及后来的会议要领等文件皆大致以此段文字为开头，可见此儒学相关的会议并非一个单纯的重建孔庙后的庆祝活动，其目的也不仅仅局限彰显日本儒教主义国民道德，更为重要的一点，甚至可以说儒道大会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以学术思想交流为手段的文化外交活动。对于会议的外交目的，斯文会诸人并不讳言，阪谷芳郎对于此会议的性质就直截了当地说：“以今次举行汤岛圣堂竣工式为契机，提倡开办同文民族亲善为目的的儒学会议”¹⁷⁾。这一定义使得儒道大会与此前的追远祭典等活动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儒道大会的规模“前所未有”¹⁸⁾的原因之一。

从请愿书中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遭遇的巨大困境，促使始终致力于政府内外文化政策的斯文会主动筹办明显带有对华外交色彩的儒道大会。侵占东北后，日本不仅与国民政府关系迅速恶化，并且由于退出国联还导致了在整个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局面。为了改变外交上的不利状况以及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日中亲善”等论调逐渐占据当时日本朝野上风，并且以两国共通的东亚道德哲学为基础打开外交局面的论调颇为流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尊孔之风复兴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展开，也引起了日本方面注意，进一步显示出正是借儒教改善中日关系、缓解排日活动的大好机会¹⁹⁾。因而此会议的“国际意义”甚至得到了以“焦土外交”闻名的外相内田康哉的赞成。

随着汤岛圣堂修复工程的进行，此后斯文会对于会议具体事项又多次调整，会议的名称由原来的“儒学会议”改为“儒道会议”，最后确定为“儒道大会”，并制定了《圣堂复兴纪念儒道大会要领》，基本上确定了大会的主要事项²⁰⁾。内阁改组后新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于儒道大会也予以了肯定和支持。广田弘毅上台伊始就标榜“协和外交”，谋求“中日亲善”，儒道大会的宗旨正与他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尤其是此会议实际以消解中国的排日情绪为目标，正中广田的下怀。同时，国民政府方面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也逐渐转向对日和缓与妥协。在两方的呼应下，中日关系呈现出一度“亲善”的局面，并以1935年5月宣布中日使馆互升为大使为标志达到高潮。而在随后东方文化联盟召开的“两大使升格欢迎会”中驻华大使有吉明和驻日大使董作宾分别作了《日华亲善从文化提携开始》和《大阪的昌隆从儒教开始》的演讲，皆重点论述了通过儒教这一共通的精神基础，增进两国的关系，以实现中日亲

16)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2頁。

17)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6頁。

18) 《儒道大会记》开篇即称儒道大会：“实乃旷古之大会未有之盛运”，载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23頁。与会的日本学者名流也多以“前所未有”“旷古”“空前”之类的词汇形容儒道大会，详见《汤岛圣堂复兴纪念儒道大会志》所载的《诸家对于儒道大会的感想》部分。

19) 不独斯文会与日本外交情报人员的观察，当时访华的日人士普遍对民国尊孔风气的复归有所注意，如“东方文化联盟”理事清水银藏中国之行回来后的报告谈话中就特别提到此点。见清水银藏「滿支視察歸朝談」（『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5号、1934年）、98頁。

20)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7-9頁。

善²¹⁾。

由此来看，儒道大会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充分地顺应了“日中亲善”的政治氛围，建立在两国部分政要的共识之上。故而，儒道大会的筹办不仅聚集了整个日本儒教界或者说“孔子教”界的力量，而且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动用了相当的国家资源。除了政府的拨款外，在文相松田源的主持下日本实业家也纷纷解囊，儒道大会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日本政学财三界对于通过儒道大会，使中日人士能够“遵循孔子教交膝促谈”“将迷梦一扫而清”²²⁾的成效有很大期待。至于如何达到此目的，在斯文会诸人看来，则要以中日两国共有的尊孔为基础，通过招待民国的名士和学者，以达到“情感融合”“理解通融”的效果，并通过民国人士在日本所见，能够对中国的舆论有所引导。而其关键正在于是否能够邀请到中国一方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因而在大会筹备工作进行的同时，邀请中方代表的事宜也就被提上议程。在儒道大会最初的构想中只提及邀请民国的学者、名流参会，此后又确定了要邀请孔子后裔参会，并且上升为最为重要的筹备目标之一。对孔裔渡日一事笔者已另撰文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三 对于中国学者、名士的邀请及回应

由于儒道大会是以对华外交为首要目的，所以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斯文会始终寻求外务省的认可和协助，一方面是积极主动地贡献于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用日本国家外交的力量邀请中方人士参会。

如上文所说，斯文会在拟定举办大会之后，很快就向当时的外相寻求支持，广田弘毅走马上任新外相，斯文会又向他提出会议的计划，并且也得到了他的同意与协助。广田命令外务省的文化事业部研究调查大会召开具体的方法，并初步决定将邀请伪满洲国及民国人士的任务交由文化事业部的岩村成允进行交涉。文化事业部长长期负责“对支文化事业”，对于中国学界的情况颇为熟悉，岩村本人此前刚刚筹办了“日满联合美术展”，此类文化外交活动他更是轻车熟路，是负责此事的不二人选²³⁾。

伪满洲国自然唯日本马首是瞻，并且此前举行祭孔等活动日本方面也有派人参加，此种“合作”自然不成问题。伪满很快就决定了文教部次长、奉天教育厅长、吉林教育厅长文教方面的高官参会，并且溥仪也计划在访日期间参拜汤岛圣堂。素来与日本关系密切并始终秉承尊孔立场的罗振玉虽没有亲自渡日参会，但是却送来了罍、觚、爵、鼎等商周时期的青铜祭器，可谓一份厚礼，至今依然保存在汤岛圣堂。而对于邀请民国方面的代表，自然不会如此轻松，日方则动用外交力量，进行了一番谋划与安排。

外务省早在大会召开的近一年前，即1934年6月13日就发电给驻中国日本公使馆及各地的领事馆，告知拟开办儒学会议的事宜，要求他们调查自己领区内合适的参会人选，并提供名单。大约1到3个月后各地领馆陆续回复推荐的人员名单，如日本公使馆负责南京及周边地区，7月19日其提供的名单为：著名学者章炳麟、蔡元培、董康、章士钊、黄侃、余绍宋，有儒学修养的名士叶恭绰、许世英、于右任、吴敬恒、

21) 有吉明「日華親善は文化提携から」(『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6号)、37-39頁。董作宾「大阪の昌隆は儒教から」(『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第6号、1935年)、40-42頁。

22)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12頁。

23)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7頁。

柳诒徵，以及大圣大儒的后裔颜敦源、方策、方秉彝；上海领事馆在1934年7月1日回电的名单包括：王一亭、陈柱尊、章仲铭、费子彬、孙德谦等人，天津、长沙、汉口、杭州、广东等地的领事馆也陆续将人选名单回复给外务省，这些名单一般还包括年龄、略历、居住地等信息。除了日本领馆外，东亚同文书院等日本在华机构也积极出力，同文书院认为在中日关系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王一亭是最为适宜人选，此外还推荐了：张元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费子彬、章炳麟、胡适、孙德谦。另外还有个人身份推荐的，日本公使馆的一位一等书记官7月14日推荐了江瀚、孙雄、吴宓、黄节四人²⁴⁾。

得到回电后，外务省就将名单转送给了斯文会讨论确定人选。到了第二年春，1935年2月22日，大会召开在即，外务省就正式邀请中方代表之事电报各领事馆，请领事馆就之前提出的名单与相关人士进行交涉，随后对希望参加的人发送请帖，并要求于3月中旬回复进度，还对各地人数（北平四五名、上海五六名、汉口一二名、天津二三名、广东二三名）以及旅费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且斯文会还提出了重点希望能够出席的名单：北平的董康、伦明、陈焕章、傅增湘、吴闿生、张尔田、孙雄、吴廷燮，江浙地区的章士钊、王一亭，天津的王揖唐共十一人²⁵⁾。

收到命令后，日本各地的领事馆正式与中方人士接触，邀请参会，但显然并不顺利，外务省要求三月中旬予以回复，但大多领馆到三月底甚至四月才回电。上海领事馆3月26日回电称王一亭、董康、梁鸿志三人确定出席，尚有四人还在考虑中，4月18日临行前则一度确定梁鸿志、董康、王一亭、汤中出席，然而仅一天后极为受日方重视的王一亭以健康问题为由最终退出。日本驻中华民国公使馆在1935年3月30日回电外务大臣，报告与当地人士交涉的结果是董康、江瀚、伦明三人确定出席，并在极力劝诱傅增湘等人，不过其后江瀚、傅增湘也以患病最终拒绝。天津于4月2日回信，说虽然在极力物色，但此前推荐的人选和斯文会希望出席的王揖唐都恰好在旅行中，原定的人士中无人能够出席，只得另选了张海若、刘彭翊两人，其后又增加了李勃言²⁶⁾。

最终实际出席的人有：北平的伦明、陈任中、陈厚吉、张江裁；上海的梁鸿志、董康、汤中；天津的张海若、刘彭翊、李勃言；此外还有原来完全不在计划中的河南“中华儒学研究会”的汪吟龙等四人主动申请参会。从这一结果来看，接受邀请的人士的影响力与数量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原设的目标人物大多落空，而不得不另寻备选，北平和天津还凑够了规定的人数，像是汉口、广东等地都无一人参加。日方对于参会人员地位有着相当的期望，如果不是参加的人数太少，绝不会同意一个1934年11月才成立的所谓的“中国儒学研究会”派四人参加。

日方原设想的豪华阵容，本身就是高估了儒道大会的吸引力以及缺乏对中国情况调查研究的一厢情愿。像是日本公使馆和同文书院所提出的名单搜罗了一干著名学者，然而其中的蔡元培、胡适属于反对尊孔读经的代表人物，更何况蔡元培几年前还曾提案取消祭孔以及废除衍圣公头衔而与孔家有直接的冲突，而章炳麟素来对日本的儒教界没有好感，都毫无赴会的可能性。斯文会特别希望可以邀请到陈焕章渡日，

24) 「聖堂復興式典及學術會議開催計畫ニ關スル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1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1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5) 「孔子祭典及儒教宣揚大會開催ニ關スル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1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1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6)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1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1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且不说这位中国孔教的领军人物当时已经去世，其在世时始终与日本儒教保持距离，坚决反对教权为外国人所染指。并且，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知识界普遍反感所谓的“中日亲善”，中山大学95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山大学教授反对中日亲善之通电》代表了这一共识，就连主张对日“低调”的胡适也在《敬告日本国民》中直言：“我十分诚恳地恳求日本国民不要再谈‘中日亲善’这四个字了。”²⁷⁾ 民间舆论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温度差，似乎没有为日本方面很好地感知。

当然日方推荐与选定的名单中也有不少既尊崇孔子又与日本交往密切的人物，如格外受到重视的王一亭。王氏作为民国著名的书画家、实业家及慈善家，素来被认为是“亲日派”²⁸⁾，长久以来不仅乐于参加在日本举办的文化活动以促进中日友好、彰显东方文化，而且还为此类活动积极地筹划与斡旋。王氏在致使汤岛圣堂毁于一旦的关东大地震中募捐赈灾的义举，在当地人中有“王菩萨”之称²⁹⁾，从多重角度来说王氏都乃参会的不二人选。然而，王氏在临行的最后一刻托病辞邀，可见其内心的纠结³⁰⁾。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王一亭积极筹备“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并担任主任³¹⁾。此会邀请了日本人在内的约700名外国人士入会，其旨趣与儒道大会高唱的“东亚亲善”“世界和平”并无二致，可见王氏对依循孔子之道，实现各国和平共处抱有希望。王氏最终未能成行的原因，除了可能对于日本再三的侵略行为感到失望，应当还受到了社会舆论压力的左右，其身处的上海由于此前的一·二八事变，高涨的反日运动还远远没有平息，因而其不得不再三斟酌。

不独反日情绪的影响，以及对“中日亲善”的不信任，日本表现出的自居儒学中心的野心，也使部分中国儒者有所担忧与抗拒。当时杂志《七日谈》上刊登了名为《孔子去不去日本》的一文就对中国尊孔派面对邻国日本尊孔“一则喜，一则惧”³²⁾的心态有十分生动地描述，喜的是日本人尊孔似足以自豪，或可以借此促成亲善阻止日本的侵略，但又担心日本将孔子所象征的儒教正统地位所夺去，而去日本参加儒道大会岂不有助使日本儒教压过中国之嫌？因而此类儒教活动应是由中国所主导的（如上文提到的“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而日本的儒道大会不免有越俎代庖而或反客为主的意味，遭到部分尊孔派的反感也实属正常。

总之，不论原本就是日方不切实际的期望，还是中方人士出于民族立场和舆论的压力，而或维护中国儒教的正统地位的心理，最终包括对日友好的王一亭等人都大多不愿趟这趟浑水，以免被看做是为日本站台的工具。最终斯文会的目标多半落空，而儒道大会也不免暗淡不少。

四 儒道大会的举办及相关活动

虽然与会的民国学者、名士成色不足，但斯文会借用国家外交力量经过半年多的交涉，如愿使得孔颜

27) 胡适：《敬告日本国民》，《中国新论》1935年第1卷第8期，第12页。

28) 沈文泉：《海上奇人王一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29) 沈文泉：《海上奇人王一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223页。

30)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1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1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1) 王中秀编著：《王一亭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667页。

32) 梦幻：《孔子去不去日本》，《七日谈》1934年第1卷第1期，第12-13页。

两家派代表自阙里渡海赴会，乃是史无前例之大事。另外，就在儒道大会举办的不久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访并参拜了汤岛圣堂。后斯文会以溥仪、总理郑孝胥、文教部次长许汝霖三人所赠资金，打造了香炉、香盒、香案一套，加以纪念。被日本儒教徒视为代表了清朝正統的满洲皇帝与孔子圣裔衍圣公代表先后的到来，无疑赋予了儒道大会非同一般的意义，使斯文会诸人倍感荣幸与激励。

1935年4月召开的儒道大会称得上日本近代史上最为隆重的儒教活动。准确来说儒道大会指的就是4月28日举办的儒教主题的演讲会，但大会前后还有孔子祭典在内的十余项大大小小的关联活动，这些活动以儒道大会为核心，实为一体。

在儒道大会召开之前，已有预热活动先行：4月20号东京日日新闻社主办了“儒教文化演讲会”；翌日，东京广播局特别播出名为“儒教的傍晚”的节目；历年在孔子祭典之后举办的“春季大演讲”，也提前到儒道大会召开的前一天进行。在以上活动中，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盐谷温、中山久四郎等日本儒教的代表学者兼斯文会的重要成员纷纷发表演说，为儒道大会及孔子祭典造势，同时也借机向民众宣扬日本儒教主义。

4月28日儒道大会在东京会馆正式开幕。会议由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为司会，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副会长阪谷芳郎、文部大臣发表祝词，此后受邀参加的学者名士依次发表演讲。此次“旷古”的国际性儒学会议聚集了日本、朝鲜、“满洲国”、台湾、民国以及德国的代表，更有至圣奉祀官孔德成代表孔昭润与复圣奉祀官颜世镛代表颜振鸿的参会，在儒教史上也称得上首次。孔颜后裔的到来使在场的“孔子教”徒激动万分，小柳司气太就说：“我从少年时起就读《论语》，而到今日，能够这样和圣贤的子孙同聚一堂，实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³³⁾ 斯文会成员峰间信吉则举出此前孔府庙产风波时，日本方面出面干涉帮助孔家一事，证明日本国民有着尽力贡献于孔家昌隆的心愿，以报答感谢孔夫子的教化之恩³⁴⁾。孔昭润依稿发表了简短的演讲，而颜振鸿事先并未准备，受再三劝说后发表了祝词。民国代表方面，前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董康、辅仁大学教授伦明、北平大学研究员张江载先后发言。大会的演讲内容无外乎称颂孔子之伟大、孔子之教对于道德风化的巨大作用，赞美汤岛圣堂复兴以及儒道大会乃空前的盛举、日本明治以来文教事业的繁荣，以及未来东亚同文各国的“团结”此类。最后盐谷温宣称大会的宗旨乃“吾人遵奉‘最上至极，宇宙第一’的孔子之道，越加宣扬其教，贡献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福祉。”³⁵⁾ 会议结束后，德川家达在帝国酒店设有招待会，包括孔颜代表在内的二百余人参加。

4月30日，举办孔子祭典，此为汤岛圣堂祭孔恢复以来的第二十九次祭典。近代汤岛圣堂的祭孔仪式作为典型的日本化的孔子祭，其形式自1907年孔子祭典会成立并制定了《孔子祭典会则》³⁶⁾ 后便确定了下来，呈现出一种日本与中国、古代与现代、儒教与神道教结合的面貌，并延续至今。1935年的祭孔仪式与历年的祭典大体相同，不过因其特殊性，增添了往常未有的一些环节，内容更为丰富，场面也更为盛大。此次祭典的流程大体如下：斯文会会员、来宾、祭主、祭官、伶人等落座；斯文会总务服部宇之吉开场发言；修祓；开扉、奏乐、警辟；祭币；祭饌、奏乐；祭主斯文会会长德川家达奉读祝文；舞乐（五常乐）；

33)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62頁。

34)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66-67頁。

35)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69頁。

36) 「孔子祭典會細則」（『孔子祭典會會報』第5号、1912年）、33頁。

斯文会总裁伏见宫拜；孔颜两家代表拜；合唱孔子诵德歌；文部省大臣致辞；来宾（总理大臣、宫内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府知事、东京市长）祝辞；撤饌、奏乐；撤币；闭扉、奏乐、警蹕；斯文会祭典部部长中山久四郎闭幕发言；相关人员依次退场。祭典的祭官由平田盛胤担任，平田乃东京地区首屈一指的神官，时任东京府神职会会长，祭典中的除去污秽与不洁的修祓乃是神道中的仪式，最为明显的地体现出了汤岛圣堂孔子祭中的神道元素。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往的祭典的费用皆来自斯文会，而自此次之后改为由文部省出资，可见祭典性质的改变。祭典到场的人物中最为显赫的无疑是皇族伏见宫博恭王，唯有伏见宫与孔颜两家代表得以先后参拜孔子像，日方这样特意的安排，无疑是为了让日中两个“万世一系”“绵延不断”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包括总理大臣、文部大臣等高官在内日本朝野上下超过千人参加祭典，是明治日本恢复孔子祭典以来，规格最高、最为隆重的祀孔祭典。倍感激动与荣光的“孔教徒”宣称：“此次祭典实在是儒学传入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孔颜二家代表的参拜，更是增添了一层光彩。”³⁷⁾ 孔昭润、颜振鸿两人代表孔颜末裔参拜汤岛圣堂，可谓是满足了日本儒教界千百年来的夙愿。

4月29日到5月5日期间，东京日日新闻社东亚调查会主办，文部省及斯文会会协助举办的儒教文化展览会在白木屋大酒店召开。斯文会、二松学舍、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涩泽家族以及大仓喜三郎、山本悌二郎、阪谷芳郎等出展展品，林家旧藏孔子像、朱舜水所携孔子像及孔子画像、佐久间象山画孔夫子像、中村不折画孔夫子像、以及藤原惺窝、林罗山、中江藤树、伊藤仁斋等日本儒者墨迹等大批儒教相关的文物字画得到展览。为在青少年中传播儒教精神，5月4日及5日、同在白木屋大酒店召开了少年少女孔子祭与演讲会，由东京当地的小石川高等小学与济美高等小学的学生参加³⁸⁾。

除了对内宣扬儒教主义，培育国民精神，儒道大会还肩负着鼓吹对华亲善与东亚团结的任务。故而，日方对于中方人员的行程和活动有着精心的安排，努力营造出“同文同种”“日中亲善”的氛围，尤其对孔颜后裔一行格外重视。在斯文会的组织下，伏见宫博恭王、首相冈田启介、德川家达、大仓喜七郎、矢野恒太等人举办了各类名目的宴席、诗书会活动，代表皇室、政界、学界、商界款待民国的来宾。5月2日，在宫内省特别允许下，孔颜代表一行人连同国外来宾参观了新宿御苑。孔颜代表还受邀前往了足利市，参观了足利学校的遗迹以及图书馆，校内的孔子庙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孔子庙”，并进行了演讲³⁹⁾。日方不仅承担重要来宾来日的一切开销，还赠予纪念品、古籍、碑帖、匾额、孔子像及奢侈品等各类礼物。与会的文献学家张江裁就称赞道：“萃两国同道于一堂，开礼乐复兴之宏局。观光谒圣，千载一时。于是而得绝佳之印象。”⁴⁰⁾ 孔昭润回国后也赞赏有加：“日人祭孔典礼隆重、整齐、严肃……，吾人对之自愧不如。”⁴¹⁾ 看出日方尊孔的阵仗和优待使得参会的民国人士有所受用，应该说儒道大会至少获得了部分人物的欢心，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此次“圣堂复兴纪念儒道大会”不可不谓之盛大，并且各种相关活动密集，不仅是日本近代最为隆重的儒教活动，也比同时期国民政府的祭孔典礼、孔诞纪念要有排场的多。斯文会力图以此扩大对内对外宣

37)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95頁。

38) 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90-91頁。

39) 《参加汤岛圣堂孔子祭并儒道大会纪略》，《学术世界》1935年第1卷第2期，第137页。

40) 張江裁「湯島謁聖後感言」、斯文会編『湯島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誌』（斯文会、1936年）、402頁。

41) 《孔府档案》未编号，转引自官美蝶，葛懋春：《万恶“圣人家”孔府》，山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页。

传的效果，树立日本取代中国成为儒教中心的形象。大会前后，除了日本本国的各大媒体，在中国受日本控制或亲日的《大同报》《三江报》《奉天公报》《江南正报》等报纸进行了大篇幅地报道宣传⁴²⁾，孔颜后裔参会往往被作为标题特别加以强调，借此宣扬日本尊孔崇儒，东亚共荣。

结语

要之，1935年日本召开了盛大的儒道大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对华的外交政策，笼络中方的尊孔人士、消弭中国的反日情绪，营造同文同种，共尊孔子的景象。笔者不欲以“文化侵略”之类的标签将此次活动不加理解地一概否定。故而，本文开篇追溯了日本祭孔的传统与汤岛圣堂所见证的日本儒教兴衰，同时也谈及了1935年前后中日微妙的“亲善”局面，意在说明儒道大会并非一孤立事件，正有着深刻内在的动力与外部环境的影响，从“尊孔”与“日中亲善”两个角度论述了其合理性的存在。

汤岛圣堂作为日本儒教繁荣的标志与中心，在日本儒教乃至整个文教领域有着重要的位置，其历经大火损毁重建落成，庆祝纪念活动自然理所应当。且儒道大会及其相关活动，也并非完全是指向对外的，同时包含着对内宣扬儒教精神，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诉求。儒学作为中日两国文化的契合点，以此为基础展开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不仅符合外交上的通常策略，也是不少中日人士所认同的可行之道。斯文会作为日本最大的儒教团体，为报答“圣恩优渥”以及政府的扶持，始终以“斯道报国”为归旨，追随日本对内对外的政策，此乃整个日本儒教的生存之道，故而举办儒道大会实乃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儒道大会也确实顺应了当时的“日中亲善”之风，而国民政府也通过同意派遣孔颜两家代表参会等方式给予了回应。

然而，究其最终的结果，儒道大会不仅实际的外交效果微乎其微，更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士及媒体的警惕乃至愤怒的态度。《新中华》贴出大会的照片并附言：“暴日乃尊我孔裔？日本举行孔子纪念展览会邀孔昭润孔士劝往日”⁴³⁾；《汉口舆论汇刊》则说：“日本尊孔，是顺着复古潮流来麻醉我们民众，最低收获，能得到腐化分子信仰和同情”⁴⁴⁾；《人言周刊》指出日本种种尊孔活动，实为复制利用溥仪的办法控制以控制华北⁴⁵⁾。易竹樵发表演讲《日本尊孔的推测》认为日本尊孔“以我的意见推测，实含文化侵略主义”，并说“日本自近世以来，每次对我侵略之后，必言亲善，诸君当能记忆，尊孔还是假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话来麻醉我国民性的老把戏”⁴⁶⁾，将此次儒道大会看做是“文化征服”中国的策略，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批判最为有力的当属鲁迅撰写的著名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此篇用日文写作并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就是要警告日本人打着尊孔的招牌达到政治外交上的目的不过是一番徒劳罢了⁴⁷⁾。

42) 相关中日新闻报道，斯文会及外务省方面有所搜集，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1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1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5015962400、1. 聖堂復興記念儒道大会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年三月 斯文会 分割4 (H-6-2-0-17)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3) 《暴日乃尊我孔裔？日本举行孔子纪念展览会邀孔昭润孔士劝往日》，《新中华》1935年第3卷第11期，第12页。

44) 老乡：《呆话（五八）》，《汉口舆论汇刊》1935年第17期，7页。

45) 人旦：《日本人竟想利用孔子》，《人言周刊》1935年第47期，第962页。

46) 易竹樵：《日本尊孔的推测》，《成章期刊》1935年第2期，第5-8页。

47)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儒道大会的收效甚微乃至反效果，与此前邀请中国代表方面的挫折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此活动筹划之初便注定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 近代以来尊孔反孔运动的接连上演，使得中国知识界对于孔子有了更为冷静和清醒的认识，以尊孔为名的政治活动早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2. 日本悍然侵占东三省，并扶持溥仪作为傀儡，大搞尊孔活动以麻痹人心，此种“同文同种”的老把戏早已被稍有鉴别能力的中国人所看穿，在其看来所谓儒道大会不过又是一翻版罢了；3. 中国当时高涨的反日情绪，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危机感，绝非一次冠冕堂皇的儒道大会所能消除，这正与并无实质内容的“中日亲善”在民间不得人心相似；4. 对一些中国儒教人士以及提倡尊孔读经政策的国民政府来看，日本大张旗鼓的儒教活动以及要求孔裔渡日的举动，实则包含着意图在儒教地位上超越中国的野心，一定程度上会被视为一种竞争而非“亲善”之表现。